

稳定边境的明初马邑移民

张俊捷

在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移民发源地，大概要算山西洪洞大槐树了。洪洞大槐树移民只是移民史的一部分，更多的迁徙鲜为人知。明朝《明太祖实录》清晰地记载了山西朔州马邑圪针沟移民。

明洪武元年（1368）八月，明军进占大都（今北京），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但以扩廓帖木儿为代表的元朝军队残部在长城一线活动，时常向明朝守军发动攻击，并掳掠边境居民。同时，“四大王”为首的蒙古贵族残余势力逃入山西太原西北部的静乐、岢岚山中，以管涔山区为中心，聚众结寨，四处攻掠。两股势力内外呼应，严重威胁到明朝的统治。为了达到釜底抽薪、斩草除根的目的，明太祖朱元璋一方面调集大军武力解决，一方面将移民作为清除关外忧患的重要手段。

《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三年（1370）六月，故元四大王寇大同、武州，太原卫指挥桑桂等击之……桂与指挥郑亨等率兵击之，追至牛尾庄（今山西忻州市忻府区牛尾庄），四大王遁走，获其三大王脱忽的帖木儿，送京师（今江苏南京）。”

“辛酉，太原都卫奏获胡寇张成等十六人，上命询胡人潜伏之所，欲用兵剿绝，勿容再聚其衆，外夷人皆令迁入内地。”按照“外夷人皆迁入内地”的政策，朱元璋把归降和被俘虏的蒙古人，全部迁入到京师（今江苏南京）、彰德（今河南安阳）、卫辉（今河南汲县）等地，后来又对蒙古人进行集中安置，除“隶军籍”外，一般“占籍为民”，即等同于汉民，就地安置下来。

由于蒙古贵族的胁迫，许多地处北边境域的平民百姓也参与了叛乱活动。对此，朱元璋先是采取了既往不咎的

态度，如明洪武六年（1373）八月，他下令：“民人无罪，悉送大同府隶籍，仍以所获牛驴给之。”但到了九月，大都督府上奏太原卫官兵捕获从胡寇为乱之民39人后，为断绝“四大王”集团的后援，出于军事上的考虑，朱元璋又下令：“边民被胡寇抄，因从其为益，不得已也。悉贷之，徙与内地。”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六年八月，大将军徐达之师至朔州，徙其边民入居内地。”《明史》把此情形之移民称为“漠北移民”。

“漠北移民”的迁出地主要聚集于朔州马邑一带。明代马邑县属大同府辖，县治位于今朔城区神头镇马邑村。清代康熙时《马邑县志》载，马邑县境“西至朔州烟墩村界一十五里”。烟墩村是神头镇一个古老村庄，明代属马邑县管辖。据《朔州地名志》记载，其“位于朔城区神头镇7.5公里处，因为村东北角有烽火墩，以狼烟报警，故名”。圪针沟在烟墩村西南隅，此地原来有一条东西方向遍地圪针的大沟，因此叫圪针沟，两地距离只有一里远，故人们习惯把烟墩村圪针沟连在一起称呼。

“漠北移民”的迁入地有三处：一是北平，即今北京市乃至河北、山东一带。二是京师，即今南京市以及凤阳府（今安徽凤阳）之泗州、虹县等直隶地区。三是雁门关以南的今忻州。考察忻州人口的来源、地方志及为数不多的谱牒资料，大都记载着“朔州马邑县圪针沟”，来自洪洞县的却非常少。

忻府区董村镇保存的郝氏家庙《敦伦会简章》及《宗谱》称：马邑县烟墩村圪针沟郝完同其本家郝从裕及其表侄张澄、张敬等一同迁来忻州。忻府区播明镇《赵氏族谱》载：朔州马邑县烟墩村圪针沟村民赵德祥，于明洪武年间迁入忻

州，来到一个新的村落，为弘扬大明长存，取名为“播明”。忻州市的邢氏，均为明朝由朔州马邑县邢家河迁入（以七里河为界，分为南北邢家河，分属朔州市城区南北）。从宗谱上初步考证，由朔州迁来忻州的邢氏先祖大约十余人。忻州北关米氏家族，据清顺治三年（1646）族谱记载：“余家先代家谱年久失传，迁忻州之后，始于米拳。”再据始祖显妣甲太夫人墓志碑记载：“明洪武三年（1370），米氏时中公，从朔州马邑县三角村，迁家属到忻州入籍……”后来又携带长子米荣与妻之妻黄氏南迁平遥县落户五里庄，而把妻子甲太夫人及次子米拳与拳之妻李氏留在北关定居。

此外，忻府区双堡邵氏、奇村镇石家庄段氏、解原村刘氏、兰村乡北场村张氏、乔村马氏、五台县怀荫村赵氏、东冶徐氏（著名人物有徐继畲、徐向前）……从他们的谱牒上看，都是从朔州马邑县迁来的。

由此看来，过去马邑县的中心，包括现在的朔州市区、朔城区东南部紧临山阴的神头镇、滋润乡、南榆林乡、贾庄乡、沙河河乡一带，紧临桑干河，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是明初“漠北移民”理想的聚集地，也是现今许多忻州居民的祖籍地。

到了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山西境内的“四大王”等人出降，蒙古人及其无辜汉民百姓的内迁活动才告一段落。从此，移民活动的性质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即从以军事性质移民为主转为以屯垦性移民为主。洪洞大槐树移民活动便拉开了历史序幕。

马邑移民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祖国大江南北诸多姓氏根源在朔州马邑的说法得到移民后裔的认同。马邑是百万移民后裔魂牵梦萦的故园。

后唐明宗李嗣源在五代算是个好皇帝，他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却不爱声色犬马，还减轻了人民的一些赋税。他统治的8年时间，在社会动荡战乱迭起的五代，算是比较安定，有几年还风调雨顺，农业取得了丰收，百姓也能安居乐业。

但此时，强盛起来的契丹，经常侵犯北方，虎视眈眈威胁着中原。这中原的北大门晋阳必须有一个得力的、信得过的人去把守，明宗就任命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来到晋阳，让心腹部将刘知远专管军事。李嗣源死后，儿子李从厚即位，只几个月后，李嗣源的养子从珂杀死李从厚，自立为帝，即后唐末帝。

石敬瑭与李从珂一起在晋阳长大，且关系不错，后来又成了内兄和妹夫的关系，就更显得亲密了。两人都是勇将，立的功劳也不相上下，李嗣源在位时还看不出什么，李从珂杀李从厚自立后，虽加封石敬瑭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还任河东节度使，但两人的关系却微妙起来，相互猜忌。最终石敬瑭上表，请李从珂让位，不然兴师问罪。

李从珂大惊，降诏削去石敬瑭的官职，把他在洛阳国都的一个弟弟和两个儿子抓起来杀了，并派晋州刺史张敬达为太原行营招讨使，率领数万人马杀奔晋阳。

石敬瑭见状，便按照事先计划，向契丹称臣，并且愿当儿子，称耶律德光为父亲，请求马上出兵救援；事成以后愿把雁门关以北的诸州割让给契丹，并每年孝敬帛三十万匹（那时帛帛当货币用）。契丹国太宗耶律德光接到这份表章，就像天上掉下个金元宝，简直是做梦都梦不到的事情，于是回信说秋高马肥的时候将倾全国人马来增援。

石敬瑭与张敬达在晋阳城相持，从五月到九月，攻的一方一直攻不下，已疲惫不堪，守的一方眼看着粮草越来越少，也不免焦急起来。

眼见秋天到了，契丹国太宗耶律德光亲自率领五万铁骑应约出师，号称三十万大军，一路无阻，从阳武河谷直扑晋阳，在汾河之北扎了营。耶律德光派人通报，石敬瑭赶紧让刘知远带兵出去助战。

张敬达虽有防备，却中了诱敌之计，伤亡惨重，晋阳之围一战而解。宋末李从珂既惊又怕，先命驻幽州的卢龙节度使赵德钧等三镇人马分头去救晋安寨，又御驾亲征。从洛阳出发途中驻跸怀州，内部对当前形势和战事争吵激烈，人们七嘴八舌，搞得李从珂心烦意乱，只是以酒浇愁，每天喝得醉醺醺。

这时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晋阳城外的唐军被围困多日，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副招讨使杨光远杀死主帅张敬达，举营投降了契丹。

其二，卢龙节度使赵德钧不仅不进兵，反倒派人带着大量金帛来到契丹营，想请耶律德光支持他当皇帝，但在石敬瑭的阻挠下，此事不了了之。

以契丹为后盾，石敬瑭开始作称帝的准备。选中晋阳城正南二三里处一个叫柳林的地方建筑祭天坛。这儿面对滔滔汾河，背拥宏大的晋阳城，西望是雄伟的晋阳西山。

公元936年十一月，石敬瑭先受契丹主耶律德光进封为晋王，然后两人在仪仗队的簇拥下登上了祭天坛。在初冬的萧瑟寒风中，耶律德光把自己的衣服脱下帽子摘下，让石敬瑭穿戴起来，然后祭告天地宣读册文，册封石敬瑭为皇帝，国号大晋，史称后晋。那册文也很奇特，其中有“把你看作儿子，你把我待如父亲”等话。——后晋同契丹相约为父子之国，后来石敬瑭在给耶律德光的表文中，开头先称“父皇帝”，落款先称臣，再称“儿皇帝”。——石敬瑭就穿着这不华不夷、不伦不类的服装，面南而坐接受群臣的朝拜。

石敬瑭当皇帝后，马上就立文书把雁门关以北的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这十六州为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儒、虞、武、云、冀、襄、蔚。这片地方相当于今天的以北京和大同为中心，东至河北遵化，西到山西神池，南至天津、河间、保定、繁峙、宁武一线以北，长城以南的大片地方。除割地外，还答应每年给契丹三十万匹帛为酬谢，耶律德光心满意足。

一切办好后，耶律德光又指示石敬瑭，说桑维翰功劳大，应该当宰相。石敬瑭当然遵命，马上就任命。接着又研究南下，说让谁留守晋阳呢？石敬瑭把自己的儿子们全都叫来让耶律德光选。耶律德光指着其中一个说：“这孩子眼睛大而有神，跟你最相像，就留他吧。”石敬瑭连连点头。其实这眼睛大的孩子叫石重贵，却不是石敬瑭的儿子，是他哥哥石敬儒的儿子，也出生在晋阳。石敬儒早死了，石敬瑭就把这孩子作为自己的养子。

“父子皇帝”率军南下，赵德钧等纷纷投降，后唐军队溃败了。至潞州后，耶律德光返国，石敬瑭指挥晋军和契丹兵联军南下。

李从珂归国都洛阳，前方坏消息不断传来，将军们败的败降的降，李从珂仰天长叹一声：“天亡我也，看起来这天下是石郎的了。”李从珂奉着曹太后，带着刘皇后还有次子李重美等，携着传国玉玺，登上了玄武楼要积薪自焚。刘皇后回头看着皇宫说：“我们马上就葬身火海，留着这宫殿干什么？不如一同烧掉。”于是放起火来，滚滚浓烟直冲云霄。

晋帝石敬瑭灭后唐后，把国都定在开封，定洛阳为西京，晋阳为北京，以大眼睛的养子石重贵为北京留守、太原尹、河东节度使。

儿皇
借兵天后唐

李海清

柳宗元的利民思想

杜贞贞 卫佳

柳宗元的故乡在今山西永济，此地唐属河东，故柳宗元又被称为柳河东、河东先生。他不仅仅是文学家，也是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他的利民思想，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回望，仍旧熠熠发光。

命不受于天

少年时代的柳宗元曾随父亲柳镇辗转于九江、长沙等地，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十分了解，在二十一岁进士及第踏入仕途后，他便开始宣传其“养民利民之术”。

古代君王常以“受命于天”来表达自己拥有的权威，柳宗元在《贞符》一文中指出，所谓“受命于天”是虚假的、荒谬的，人民才是朝代更替的决定性力量。他写道：“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统治者不是受命于天，而是受命于民，民心、民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祥瑞是不可靠的，只有施行仁政，才能使万民欢欣。

在柳宗元看来，统治者要让百姓安居乐业，应当鼓励百姓按照自己的优势与兴趣谋发展、求利益。在《晋问》一文中，柳宗元写道：“所谓民利，民自利者是也。”民自利者，即顺人之欲，随人之性，而非让不懂民情的官吏指挥。在柳宗元的寓言文章《种树郭橐驼传》中，他批判“好烦其令”的为官之道，临民之官一会儿传达上级命令要求百姓用力耕耘，一会儿督促百姓早日收获，百姓为了接待他们连饭都吃不上，遑论顾及自己的营生呢？为此，柳宗元提出“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观点，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给予适当的指导，激发民众的积极性，不能用力过猛或全不用力，这种“民利观”对于今天如何顺应民意、避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有一定的鉴戒意义。

民不为吏役

柳宗元二十一岁进士及第，三十一岁任监察御史里行。监察御史里行品级不高，主要职责掌百官违纪，和现在的纪检监察干部的职责相当。后来，因参与永贞革新失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在永州生活的十年间，他一腔抱负难以施展，孤独万千却从未消沉，他更广泛地接触大众，对普通民众的艰辛生活有了更深的了解。

对于即将到地方任官的官员，柳宗元往往在临别赠序中对他们敬告忠言。在任监察官员时，柳宗元在《送宁国范明府序》中明确提出“夫为吏者，人役也”，反对官吏是役民的观念。后来柳宗元在永州时，在《送薛存义之任序》中同样提出“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官员所受的俸禄，都是出自百姓的赋税，不可“受其值，怠其事”，更不可“从而盗之”。

柳宗元认为民众是官吏的依靠，官吏应该对民众负责，想民众之所想，急民众之所急，同时民众有权对那些



永济柳园内的柳宗元雕像

“受若值，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官吏进行黜罚。在一千多年前，柳宗元能提出这样的见解，实属难能可贵。

贫不以为忧

纵观柳宗元的人生轨迹，他始终关心民瘼、重视民生，从他的传世著作中，可以深切感受到他用自身的行动践行着传统廉政文化。

柳宗元认为做官要懂得知耻。知耻责己，为的无非是“清白”二字，不给他人以诟病的口实，这是做官的底线和起点。在《雷塘祷雨文》中，柳宗元自述，自己任官“廉洁自持，忠信是仗”，意思是用廉洁来要求自己，以忠信作为处事的原则。在《梓人传》中，柳宗元强调“夫绳墨诚陈，规矩诚设，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矮者不可张而广也”，规矩一旦定了下来，就不得逾越，须严格遵守。柳宗元一生坚守清贫，但他却不为此忧愁，而是能安然处之。柳宗元去世后家中没有积蓄，家人无力治丧，灵柩停放在他生前喜爱的罗池西北侧，到了第二年，亲朋好友帮忙筹集了丧葬费用，才将他的灵柩运回老家河东下葬。

清白、清廉、清正、清贫，构成了柳宗元的廉洁观。柳宗元在《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中，提及“嗣家风之清白，绍遗训于儒素”，可见这种清廉为官、清白传家的风尚其来有自，又传承有方。



潞城甩饼

潞城甩饼

格格

在晋东南的庙会上，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无论在哪里，甩饼摊总是最多的。

甩饼是上党地区的一种汉族民间小吃，因起源于长治市潞城区，故又称潞城甩饼。甩饼是春饼的一个品种，在潞城一带，人们多用驴油制饼，吃的时候再卷上腊驴肉，油汪汪、香喷喷。

相传唐代李隆基任潞州别驾时，微服私访至潞城县南门口，走进一家拉面火烧铺想吃碗拉面。店伙计在和面时，水放多了，不小心把面团掉进了油盆里。店主师傅灵机一动，把油盆里的面团拿出来，放在案板上擀成圆饼，撒上椒盐面，两边一叠盘成圆形，用擀杖擀饼。因和面时水放多了，面团有收缩性，所以店主就擀一擀、甩一甩，待饼片甩得薄厚均匀，立刻放在打火燃烧的鏊上烙制。饼片一上鏊，因皮薄表层立即鼓了起来，他用手指将饼的上方捅了一个窟窿，顿时洞开气跑，手指被烫伤的店主不由得在葱花盆里蘸了一下，手上带出了葱花，他随手把葱花甩在饼上，翻了个，即刻端给客人吃。李隆基边吃边问：“这叫什么饼？又薄又软，又焦又香。”店主支支吾吾答不上来。李隆基便说：“我看你的饼是甩圆的，就叫‘甩饼’吧。”从此甩饼成了潞城一带的特色食品。

晋之味



“新华商行”当年开办在碛口镇四和堂

红色记忆

后唐明宗李嗣源在五代算是个好皇帝，他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却不爱声色犬马，还减轻了人民的一些赋税。他统治的8年时间，在社会动荡战乱迭起的五代，算是比较安定，有几年还风调雨顺，农业取得了丰收，百姓也能安居乐业。

但此时，强盛起来的契丹，经常侵犯北方，虎视眈眈威胁着中原。这中原的北大门晋阳必须有一个得力的、信得过的人去把守，明宗就任命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来到晋阳，让心腹部将刘知远专管军事。李嗣源死后，儿子李从厚即位，只几个月后，李嗣源的养子从珂杀死李从厚，自立为帝，即后唐末帝。

石敬瑭与李从珂一起在晋阳长大，且关系不错，后来又成了内兄和妹夫的关系，就更显得亲密了。两人都是勇将，立的功劳也不相上下，李嗣源在位时还看不出什么，李从珂杀李从厚自立后，虽加封石敬瑭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还任河东节度使，但两人的关系却微妙起来，相互猜忌。最终石敬瑭上表，请李从珂让位，不然兴师问罪。

李从珂大惊，降诏削去石敬瑭的官职，把他在洛阳国都的一个弟弟和两个儿子抓起来杀了，并派晋州刺史张敬达为太原行营招讨使，率领数万人马杀奔晋阳。

石敬瑭见状，便按照事先计划，向契丹称臣，并且愿当儿子，称耶律德光为父亲，请求马上出兵救援；事成以后愿把雁门关以北的诸州割让给契丹，并每年孝敬帛三十万匹（那时帛帛当货币用）。契丹国太宗耶律德光接到这份表章，就像天上掉下个金元宝，简直是做梦都梦不到的事情，于是回信说秋高马肥的时候将倾全国人马来增援。

石敬瑭与张敬达在晋阳城相持，从五月到九月，攻的一方一直攻不下，已疲惫不堪，守的一方眼看着粮草越来越少，也不免焦急起来。